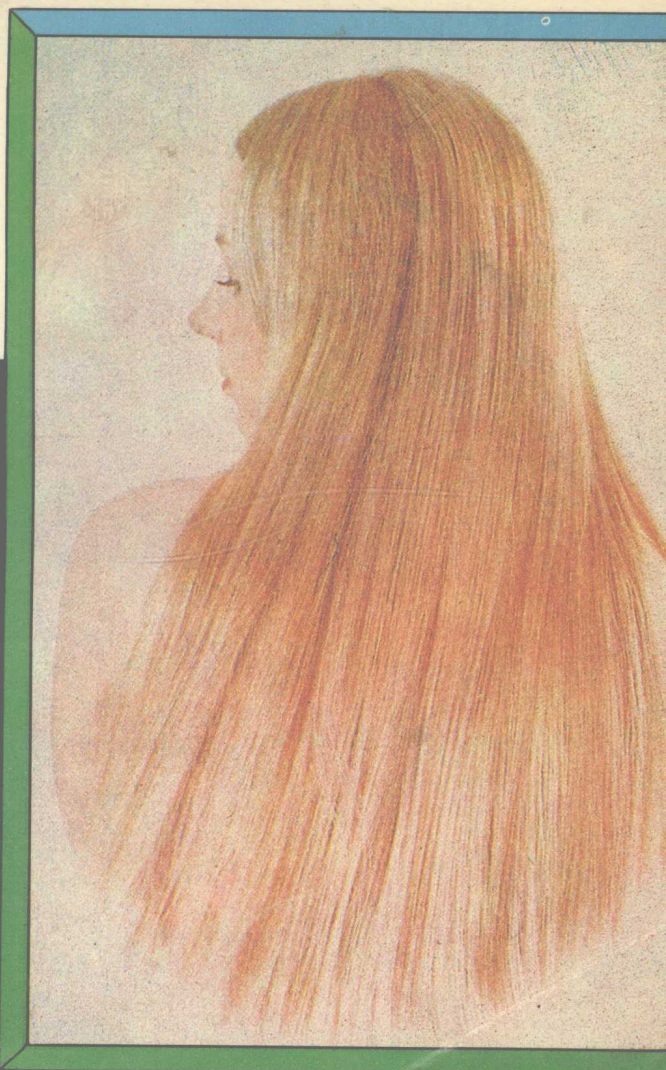


处女的号角

林清玄·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有许多东西是不能过份快速的；我们用心跳的节奏接近现代人焦灼的心灵，这是文化盲点？还是繁华都会灿烂的皇冠？



处女的号角

【台湾】林清玄·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崔用麟

封面设计 赵宏光

责任校对 刘文英

处女的号角

〔台湾〕林清玄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延吉市延西街）

辽宁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170千字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统一书号：105634·1 定价：1.98元

高值文化的危机

——《处女的号角》代序

林清玄

我有一些做服装设计的朋友，看到我在台北住了十几年，外表还象山内刚出城的土包子，好心的建议我参加一些服装界的活动，除了创造形象而外，也可以增加文化的视野。

有一位最热心的，不论如何要请我去参加一个服装秀，说是那个秀所有的模特儿全是巴黎一流的，而且带来的服装全是世界名牌，千万不可错过。

我被连拉带骗的到“来来饭店”看时装表演，会场上气氛热烈，衣香鬓影自不在话下，只见节目表上印了这样几行字：

“亚洲已在世界服饰市场中占有重要一席。这是要感谢阁下对服饰有特佳的鉴赏力与尊贵的感性。”

晚上七点半开始的服装秀，还不到九点已草草结束，模特儿确是土邀，服装也不错，听说领队 Olivier Massart

还是巴黎一流的“时髦职业专家”。朋友告诉我，象这样整齐的服装秀，在台北非常少见。

我过去因缘际会，在巴黎、纽约、新加坡、香港也参加过类似的服装秀。由于有保留票根的习惯，不免向朋友要来票根留念，不要还好，要了吓了一跳，原来我们坐的“荣誉席”，一张票竟是二千元台币，正合五十美金。才知道表演分成三种座位，另外有一千六百五十元的“贵宾席”，即使坐在最后一排最角落的“嘉宾席”，一张票也要一千二百五十元。

这种价钱实在令人不解，在国外的服装秀，最高级的，附餐饮的，顶多也不超过四十美金。我想起，这些年来台北请过许多世界一流的艺术团体，从来没有一种票价比得上这个服装秀。

朋友见我吃惊，说：“你想想，这群人坐飞机从巴黎来，票价这样是合理的。”

我说：“可是，从纽约来的一百多人的交响乐团，从维也纳来的一百多人合唱团，连乐器一起坐飞机，也卖不出这等价钱呀！”

“其实，主办单位算是有良心的，因为台北看这种表演的人数是一定的，如果票价定为一万，来看的还是同样的人，对有钱的台北人来说，一万和二千是一样的。”朋友又说。

我和朋友道别，走出来来饭店，突然大雨倾盆，我站在饭店的骑楼下，看看许许多多撑伞等公车的人，禁不住

心底袭上一股凉意。对少数人来说，一万和二千也许没有差别，对大部分人，一百和十元中间，就是很大的距离了。

站在雨中，站在人群里，想起一些台北人的消费，不正是克罗伯（A. L. Kroeber）所言的“高值文化类型”（High-value Culture Pattern）吗？他认为文化在某一部分特殊发达，它的范围就比较狭小，生命也愈显得短促，反而不如低级文化在各方面较平均，更能稳步前进。

文化某一部分趋向高值，它的气数也就可悲了。

过不久，台北有一家专卖“克丽丝汀·迪奥”的专卖店打折，最低五折起。

有一天我散步路过，转进去看，价钱象拳击选手强而有力的勾拳，打得我冷汗直冒。一件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丝衬衫，标价竟是两万元，打五折后是一万。一条丝巾标价八千，打折是四千。比较贵的东西更不用说了，都是以万为计算单位。

奇怪的是，这样贵的店竟是门庭若市，喷得香水满屋的女士趋之若鹜，抢购的热潮有如在超级市场买香皂。

很不巧的，我去年在意大利罗马机场过境，买过一件迪奥的衬衫，当时花了二十美金，此番在台北迪奥店中正好看见一件一模一样的衬衫，标价是七千八，打折后三千九，正合一百元美金，如果不打折，则是意大利的十倍之价。

这个巧遇使我迷惑不已，为什么同样的名牌，在台北

正好是国外的十倍，而还有人抢着买来穿呢？

这不能单说台北人迷信名牌，而是文化一种极端失衡的现象。我们迷信的不只是“名牌”，也迷信“价钱”，认为只有价钱高的才是真货、才是好货。

我就认识一个暴发户，全身都是名牌，连内裤都是，有一次我表示不信，他还当场翻开内裤的标签，说是花了一千五百元买的，我觉得可怜，因为说穿了也只是一条内裤而已。

这种弥漫着的对于价钱、商店的迷信，改变了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在敦化南路许多专卖名牌的服饰店，我因为家在附近，经常路过。有时好奇走进去看，几乎每一位店员小姐都是无礼的，眼睛长在天花板上，根本就不愿搭理人。原因无他，只是我身上没有一件是名牌，她们压根儿看不起这样的客人——因为她们在名牌的店里服务，也以为自己已经是名牌了，看不起一般的国民。百货公司的名店专柜也是如此，只要我们穿牛仔裤凉鞋走进去随意看看，马上是白眼不断，百试不爽。

有一回我小心翼翼问一双皮鞋的价钱，店员小姐白眼一翻说：“不用问，你买不起的。”我说：“看看总可以吧？”她冷笑一声，把头别过一边，说：“一双一万二，你能买吗？”

我不禁怀念起在欧洲逛街的情景，同样是普通的穿着，逛的是一流名店，却从未受到这种待遇。但是在台北，我们却天天遇到这种骄纵而不知天高地厚的店员，她们卖的

是进口名牌，自然看不起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了。

店员的无礼不是个案，而是文化普遍的现象，她们被价钱和牌子的病菌腐蚀而不自知。

对于台北日渐猖獗的这种现象，我有时不免忧心的和一些朋友谈起。有一个朋友说得最好，“一根油条，只要你贴上名牌的标签，在台北卖一千元也有人买，因为有人买的不是油条，而是标签。”

标签既然成为价值的标准，那么商标的仿冒是不可能禁绝的。我工作的地方靠近万华，上班时会走过万华的成衣商店。有一天惊奇的发现到，在那一堆堆的成衣中，时常翻到“名牌”的行踪，一件在名店里数千元的名牌成衣，在这里二三百元就能买到，样式和质料全是仿冒的，有一部分真的做得能够乱真。

店员告诉我：“只要贴上名牌的标签，衣服就特别好卖，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但宁可买假的名牌衣服，也不肯买土牌子的衣服，不知道是什么道理。”

道理非常简单，因为穿出去，别人根本不知是冒牌货，可以骄其妻妾，可以提高身份——但这是多么可悲！表示我们不只是有钱人以名牌是尚，连穷困的民众，也受到这种虚浮的感染。

我曾在乡下路边，看人摆摊子卖“劳力士表”，一只八百到一千五，乡下人买得极为热烈，那表的外型做得象真的劳力士，但是性能是毫无保障的，还不如买一个普通

的手表。乡下人买劳力士表的假货，心理和买名牌的服饰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总有那么一天，他们宁可买仿冒的名牌，也不肯买土牌子的真货了。

有钱人如此，贫困者如此，乡下人如此，知识分子又何尝不如此，洋博士奉如瑰宝，土博士论斤批发。我们在台北知识圈里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他是什么学校毕业？他读什么系？他的身世如何如何！”一旦是名校名系，还有一个好的家世，就好象一张血统证明令人肃然起敬；如果是土校土系，苦学出身，那就象路边的成衣了。

知识的评价如此，就不能怪商品仿冒了，知识分子也迷信知识的“名牌标签”，怎能责备小市民不以名牌是尚呢？

我想起赫胥黎在《进步的新定义》中，引用优生学来谈进步，说文化的进步源于两种选择，一种是“自然选择”，一种是“人文选择”，我们的文化则既不是自然，也不人文，而是“商标选择”，是“名牌选择”，是“价钱选择”，那么文化进步的希望在哪里呢？

持平的说，“名牌”当然比“杂牌”有可信赖的元素，但是当名牌的价钱超乎了社会一般的负担，或者说连外国人看了都要冒汗的时候，名牌的选择就要重新检验了——在国外值二十美金，在台北是八百台币，才合乎检验的标准。

不用说那么远，看看最近引起争论最多的麦当劳汉堡的价钱，民生东路分店一个大麦克卖七十八元，在美国是

一点三美元（台币五十元）；在香港卖七元港币（台币三十五元）；在新加坡二点八坡币（台币五十三元）。听说台北的价钱乃是全世界之冠。

为何吃同样的汉堡，台北人就要付出全世界最贵的价钱呢？最奇怪的是每天还门庭若市，要排队才买得到，这是基于什么心理呢？我想台北人是花得起的，这种心理和二千元看服装秀，花十倍价钱买名牌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前者是有钱有闲者，后者是一般升斗小民罢了。同样的是，都是一种时髦，为了时髦，冤大头也可以当。

朋友谷文瑞在美国麦当劳总公司当经理级以上的职位，时常巡回于世界各地的麦当劳考察业务。他说在菲律宾的麦当劳店员，大部分是坐宾士汽车来上班的，他们的薪水还不够付宾士的汽油费，但争先恐后的要进麦当劳做店员，原因是在美国的店里服务，是当地的时髦。

他还说，远东几个地方，麦当劳的营业是世界最好的，好到连总公司都想不到。菲律宾分店开张，第一个月营业额打破世界纪录，新加坡分店开张，打破世界纪录，香港也同样打破世界纪录，现在所有的纪录被台北分店打破，并且保持着。他说：“恐怕崇洋媚外的心理还是免不了的。”

崇洋崇到汉堡包，真是奇谈。

用文化观点来看，这种现象是文化学者所说的“缺乏自觉”，而且是“缺乏理性的自觉”。心理学家把人的意识分成两部分，象海里的礁石，露在海面上的是自觉意识，埋在海里的是不自觉意识；而且自觉意识是人类所独有，

禽兽的行为则都是不自觉的。

有很多人明明知道名牌在国内的价钱远超过世界各大都市；有很多人也知道麦当劳在台北比任何地方都贵；照理说应该使我们“自觉”，偏偏我们都宁可当不自觉的冤大头。如果说台北没有衣服穿，没有食物吃，也就算了。偏偏不是如此，才叫人泄气。

我们的文化问题不平衡，不仅反映在衣着与食物，最近有许多小事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道理。

例如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在该国引起轰动，台湾电视公司就计划把《阿信》的剧情抄来国内放映，华视、中视马上跟进，卷起一阵“阿信风”。

电视台抄袭成风，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是以前是偷偷的抄，到《阿信》一起，则是公然抄袭了，《阿信》在这里成为一个“名牌商标”，人人为了图利，只好不管仿冒了。最讽刺的是，电视新闻不是天天在仿冒吗？为什么自己先公然干起这种勾当？

根据《阿信》一剧的制作人在日本时代杂志中表示，“他并不以日本观众的称赞为满足，也要使日本人在潜意识里，能在这剧烈的变动社会中，保有奋斗的勇气。”可以知道他们制作这个连续剧的根本企图。而我们的电视台为什么要抄袭呢？而且一抄要抄到七十集？无非是贪图便宜，趁机图利而已，抄袭的东西减少多少人力，何乐不为？

我们过去偷偷在悬疑剧抄抄“土曜剧场”，在爱情戏

抄抄“火曜剧场”也就算了，此次大规模公开的移花接木，是把观众当成“冤大头”的做法，而电视公司本身则缺乏理性的自觉，这是电视台的堕落，也是文化的失落。

电视公司为了卖钱，拿观众当牺牲品的做法，和乱花钱买名牌往身上套的暴发户是一样的。花几倍的钱买名牌固然是愚笨，但买仿冒名牌则更是愚不可及了。作为一个观众，我是宁可看自己创作的电视剧失败再爬起来，也不愿看从日本抄袭的连续剧。

那么《阿信》呢？

别忘了，台北有数万部录影机，影带公司就提供了原版的《阿信》，不必我们的电视公司花时间去仿冒名牌商标的事了。

谈到电视，免不了也想起现在的电影。

我们的电影目前最热门的题材，说起来几乎令人不能相信，不是妓女，就是舞女、吧女，全是拿“特种营业”的人当主角。

细细数一数吧，现在正在拍，或即将开拍的有关妓女舞女的题材就有：

《南京的基督》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在室男》

《孤恋花》

《莎哟娜拉、再见》

《我的名字叫莲花》

《人命关天》

.....

说这是巧合，也未免太巧，上面还有一部《看海的日子》，附带还有《杀夫》。拿名著来拍电影，拿妓女舞女来拍电影并没有错，错在于，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把一个题材拍垮，直到把名著拍烂才肯罢休呢？

有妓女就有流氓，我在私底下的观察里，觉得中国的电影和电视，男人扮流氓，女人演风尘女郎总是演得最好，一直找不出什么原因。后来才发现，我们这个社会里，四周都是流氓和风尘女郎，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男人不能单独在西门町逛街，多到找不到一家干净的理发厅理发。我们深一层看，其实电影电视多少还是反映出一些人生的。

由于社会文化的畸形发展，连带的，电影电视也畸形发展，它不是稳步向前的，而是“捡到篮里都是菜”，这一阵子，他们给观众的菜就是“特种女性进场候教”。

虽然我可以肯定的说，特种营业女性的电影会过去，就象社会写实风潮，象三厅爱情风潮，都会过去一样。但我们的电影、我们的艺术，乃至我们的文化，为何不能有更大的包容与选择呢？为何妓女电影与纯情电影不能在同一时间并存呢？那是我们拍电影是在“谋利”，而不在拍电影。

电影要有利可图才有人拍没有错，但为什么同一时间一定要抢拍同型的电影呢？——这其实也反映了一种文化失衡的现象。

看了以上的叙述，我想我们的文化发展已到了“危机时代”，质变与量变往往会令我们陷入蒙蔽而不自知，在转移的时代我们也往往失去理性的自觉，不能认识自己。

但是对周遭事物的反省仍是相当必要的，反省是一件痛苦的事，正如黎德（Winwood Reade）所说：

“人类在每一代中都是遭受痛楚的，但他们的子孙却可以因他们的痛楚而获惠。我们自己的繁荣是建基在祖先的痛苦之上。那么，我们应当为未来的一代而承受苦难。”

如果在“危机时代”我们不能承受反省的痛苦，那么将来我们子孙在文化所承受的苦楚必百十倍于今日。想一想，当我们的后代为了追求名牌而没有理性的自觉；当我们的下一代成为“麦当劳少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当我们的下一代看抄袭的电视而不知发言抗议；当我们的下一代全以物质做标准，没有对人的应有礼貌；……我们的文化将会如何呢？

记得我在希腊旅行的时候，曾在德尔菲城的阿波罗神殿上看到两句话：“了解自己”（Know thyself）和“勿趋极端”（Nothing too much），内心深受感动，我认为这才是健全的文化精神，是我们反省的标尺——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有这种明确的理念，儒家说的“反求诸己”和“中庸之道”不就是了吗？只是我们在盲目的高值文化追求里，无知的迷失了。

目 录

高值文化的危机·····	1
——《处女的号角》代序	

卷 一

庞克文化在欧洲·····	3
文明的耻辱戳记·····	13
——世界性的古物外流	
行路的品质·····	21
处女的号角·····	26
成人的意义·····	31
——年龄的分级制刻不容缓	
文化的盲点·····	42
青春慢走! ·····	55
犯罪者的故乡·····	67
替天行盗? ·····	75
——正视盗印及仿冒问题	
理想的文化村·····	87
——波里尼西亚文化村	

说英语的孔子·····	94
——侧看新加坡文化	
夕阳牛车水·····	101
现代服装的文化灵感·····	107
都市的皇冠·····	113
一样的歧路，不同的灯·····	118
——歧路灯·联考教育的联想	
飞觞醉月·····	122
——诗词之酒	

卷 二

中国艺术与台湾艺术·····	143
情人与诗·····	147
声音的羽毛·····	151
苏芮与崔姬·····	154
——徘徊在两极之间的大众文化	
呼吸与心跳·····	165
白髯三千丈·····	168
——大千的形象与生活	
为中国戏剧摆渡·····	177
——话说《游园惊梦》	
长错了一根骨头·····	187
——《游园惊梦》梦醒了	
林怀民的十年心路·····	194

十年夜雨，十年灯·····	204
——云门舞集的十年薪传	
园子里的年轻人·····	210
“电检假期”之外·····	214
留白的极限·····	221
——评许博允的“音乐会”	
马水龙、张己任谈音乐教育·····	230